

凭窗读史

孔子到底长什么样

9月28日,又到了每年一度的孔子诞辰日,人们在纪念孔子之时,恐怕也会好奇,孔子到底长什么样?作为儒家文化创始人,孔子既是我们最熟悉的一位古圣贤,也是最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人之一。他的理念不仅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中国人,还深刻影响了东亚、东南亚等儒家文化圈。

孔子是西方人最熟悉的中国人。在美国最高法院的门槛上,孔子与古埃及的摩西、古希腊的梭伦的塑像并排站立。法国1793年宪法所附《人权宣言》,写入了孔子的名言“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”。

就是这样一位现代人最熟悉的古人,我们对他的相貌如何,却知之甚少。翻开《论语》,我们可以看见孔子的笑——“莞尔而笑”,孔子的哭——“颜渊死,子哭之恸”,孔子的怒——“是可忍也,孰不可忍也”,孔子的骂——“朽木不可雕也”,甚至孔子如何穿衣、吃饭、如何睡觉的细节都有,但是对孔子的相貌少有论述。



见老子(左一)。东平汉墓彩色壁画局部孔子(左二)

■ 孔子是“反字”的“长人”吗

距离孔子两百多年的荀子说,孔子“面如蒙俱”。杨惊注:“俱,方相也。其首蒙茸然,故曰蒙俱。”说孔子的脸像驱鬼的神像。这是一个比喻,喻体和本体有不止一个相似之处,关键看取的是什么相似。一般理解为孔子的脸长得和驱鬼的面具一样,给人以凶神恶煞的感觉。也有人认为,是说孔子的脸有威慑感,就像驱鬼面具一样,具有威慑力。结合《论语》中说孔子“温而厉,威而不猛,恭而安”,后一种解释似乎更接近实情。

司马迁的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被后世看作信史。他距离孔子已有三四百年。当时经学兴起,带有迷信色彩的讖纬之学中就有关于孔子容貌的内容。比如《孔子反字》,是谓尼甫(一作尼邱)《礼记·含文嘉》。

班固《白虎通·姓名》篇记载:“孔子首类鲁国尼丘山,故名为丘。”所谓“首上圩顶”,唐司马贞《史记索隐》解释,“圩顶,言顶上窟也”,窟通洼,凹低的意思。“圩顶”即指头顶凹陷。由于圩顶取象于尼丘山,所以被称作“尼首”。《后汉书·高获传》记载,高获“为人尼首方面”,唐代李贤注曰:“尼首,首象尼丘山,中四方高也。”

司马迁说,孔子“生而首上圩顶,故

名曰丘云”,应该是受到当时民间传说的影响。在《孔子世家》中还有孔子父母“祷于尼丘得孔子”一句。这似乎说明,孔子得名有两种说法,一是得名于出生时头部的生理特征,二是得名于家乡的一座山名。如果孔子出生前,父母确实“祷于尼丘”,那么得名于尼丘山似乎顺理成章。反驳此说的人则考证古人“不以山川”命名的原则。

持前一说的学者,认为孔子得名于生理特征,征引了现代医学来解释,婴儿期如果患有腹泻等症,会引起婴儿前囟门凹陷,明显低于周围颅骨。学者推测孔子出生后患病,导致前囟门凹陷。孔子父亲叔梁纥在孔子出生时已经年过六旬。由于父亲年龄偏大,可能影响了孔子先天体质。学者引用晋成公名“黑臀”(“黑臀”当为胎记)来佐证孔子之命名。类似的还有郑庄公名“寤生”(“寤生”近似今天“逆产”)。

如果孔子的名字得自山名,那就和相貌无关。如果得自生理特征,则与相貌密切相关。以上两种说法,各有道理。在没有更加过硬的证据之前,只能两存之。

再说孔子的身高。《孔子世家》说孔子“长九尺六寸,人皆谓之‘长人’而异之”。根据战国、汉代出土实物,一尺

约合23.1厘米,这样孔子就有2.2米多高,和篮球健将姚明相当。这应该也和当时的讖纬之学有关。汉代《春秋纬》:“孔子长十尺,大九围,坐如蹲龙,立如牵牛,就之如鼎。”这样看,司马迁还是比传说中少说了一点。孔子的身高在《论语》中同样找不到佐证。不过,孔子的父亲叔梁纥是春秋时鲁国的一勇猛将,曾扛起重达一半的城门,故同伴出去,“曾扛起重达一半的城门,故同伴出去,“曾扛起重达一半的城门,故同伴出去。”

孔子也有类似父亲的功绩,《吕氏春秋·慎大》载:“孔子之劲,举国门之关。”关,指门闩,国门之关,指用一根巨大横木做成的门闩。孔子力气虽然不及他父亲,只身托举起城闩,但举国门之关的力气,也非常人可比。《淮南子·主术训》篇记载孔子有多项本领:“孔子之通,智过于管仲,勇服于孟贲,足履郊藁,力招城关。”“力招城关”,即“举国门之关”,可见孔子并不是一身书生气的大夫,而是豪杰。

在民间,相传孔子相貌有“七露”之说,即“耳露轮、眼露白、鼻露孔、口露齿”,这种说法最早见于金代孔元措所撰《孔氏祖庭广记》。民间流行的许多孔子像都具备上述特征。

是为双绝。这幅孔子像是迄今流传最广泛、影响最大的孔子“标准像”。

为孔子画像代不乏人。明代出现了按编年顺序反映孔子一生言行的连环画册。这些画册被称作“圣迹图”。今天我们见到的各种“圣迹图”,应以明正德九年(1444年)张楷序刊的“圣迹图”木刻本为最早。清代改琦手绘的《孔子圣迹图卷》现存10幅,属名家真迹。

两幅明代佚名画家的《孔子燕居像》是流传较广的孔子像。

近代以来孔子画像更是数不胜数。任伯年、徐悲鸿、黄羲、戴敦邦、刘国辉、毕建勋、马振声、黄发榜、冯远、于安万、孔维克等名家都创作过相关画像。

十多年的心得。

当代画家创作历史人物画,已有很多成功先例。如蒋兆和创作的张仲景、孙思邈、张衡、祖冲之、曹操、杜甫、李时珍;刘旦宅创作的秦始皇,李斛创作的关汉卿,都被大众所接受和认可,教科书上以他们创作的形象为这些历史人物的画像。

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杰出人物,是我们当代艺术家创作的重要宝藏。我相信,在新的历史条件下,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,我们艺术家可以创作,也应该创作出新的形神兼备的孔子形象。新的孔子形象应该既能体现历史上孔子的神韵,同时也能被现代广大读者所接受和认可。新的孔子形象既是赓续传统的,又是符合时代审美的。

柯琦



二十世纪初的杭州西湖文澜阁。

陆费墀与《四库全书》

清代编纂的《四库全书》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汇编丛书,也是融传统文化于一体的集成之作。说起《四库全书》,人们最先想起的往往是才高八斗的纪晓岚,即担任全书总纂的纪昀。其实《四库全书》的编纂历经了征书、编纂、誉校、装订等漫长的艰辛过程,凝聚着成百上千人的心血与智慧。出任全书总校、后来更因此而身死家毁的陆费墀(chí),就是其中之一。

■ 赞修书自始预事

陆费墀(1731年-1790年),复姓陆费,名墀,字丹叔,号颐斋,浙江桐乡人。他自幼聪敏,涉猎广泛,不仅精读传统的经史诸子,而且堪舆、医卜、木数、方技等亦“靡不究晓”。乾隆三十一年(1766年),36岁的陆费墀喜中进士,随后出任翰林院编修,参与内廷典籍编纂。

《四库全书》由乾隆三十七年

(1772年)安徽学政朱筠所上“修书”奏折引发。时任东阁大学士刘统勋曾以修书非急需“政要”,意欲阻挠。户部尚书于敏中则认为朱筠建议符合“文治天下之大计”,因而“固争执”。由此在朝堂间引发是否开馆“修书”的刘(统勋)、于(敏中)之辩,两者相持不下。

很可能在此酝酿往还的过程当

■ 任总校肩挑重担

乾隆启动《四库全书》编纂,意在“用昭穆府大成,自秩唐宋而上”,因而期望甚高,对编纂也提出了极高要求。但《全书》分经、史、子、集四部,体量巨大,修书所用底本又来源多样,版本歧异不一,传抄之误在所难免。为保证编纂质量,“四库馆”设立了分校、复校、总校、抽查等诸多流程。出任总校的陆费墀,遂成为统筹校核质量的关键人物。

早在开馆之初的乾隆三十八年闰三月,武英殿总裁王杰就以馆存底本“必须折衷画一,应令武英殿提调、翰林陆费墀董司其成”。陆费墀由此承担起总校全书、“酌改字样”的重要任务。于敏中也多次强调校勘的重要性,写信反复叮嘱:“承办《全书》及《荟要》分校诸公,当请其到署,以此日致致之。各宜经意,勿留错误之迹,日后取咎。总祈慎之又慎为嘱,并与丹

■ 受赔补身死家毁

陆费墀与于敏中的密切关系,既为其得以自始至终参与《全书》的编纂提供了契机,也为他最后的人生悲剧埋下了伏笔。

四库馆开馆后仅一年,于敏中涉太監泄密案,逐渐失去乾隆帝的信任。乾隆四十四年(1779年),67岁的于敏中病逝家中。几年后乾隆帝下令将于敏中牌位撤出贤良祠,“以昭儆戒”。此期一直在四库馆全力修书的陆费墀,多次受到牵连。

早在乾隆四十五年(1780年)三月,武英殿总裁王杰就以馆存底本“短少”,弹劾陆费墀“办理毫无章程”。乾隆帝称陆费墀“专司提调,前后数年,事出一手”,其渎职之责不可推卸,同时斥陆费墀倚仗于敏中,“假藉声势”。乾隆帝将陆费墀先行撤职,降阶降官,此时距于敏中去世不过数月。但经过反复盘查,发现短少底本不过30余种,远不及王杰指控的四五百种。且底本短少主要缘于

人员混杂,“收发不清”,并非陆费墀一人之错。乾隆帝见此将陆费墀官复原职,令其继续编纂,但认为陆费墀仗势“牟利”的偏见,却没有太大改变。

这一隐患,在乾隆五十一年(1786年)于敏中牌位撤出贤良祠后再次爆发。乾隆四十六年底,首部《四库全书》即文渊阁本编纂完成,进呈后获得乾隆帝称赞,随即下令再抄六部,分藏于盛京、承德、圆明园及江南的扬州、镇江、杭州等地,以昭“藏书丰富、教思无穷之盛哉”。《四库全书》卷帙浩繁,誊录人员参差不齐,但在陆费墀等人督促下,上呈“御览”的《荟要》及文渊阁《全书》定本,校勘质量应该还是不错的。不过分抄“北三阁”“南三阁”藏本时,“大功告成”的松懈情绪逐渐滋生,“捷于鹘”的侥幸心理也或多或少存在,因而抄本错误增多,在所难免。

著名史学家陈垣先生因此总结说,清代《四库全书》等官修书籍,“第一求速,故不能不草率;第二求无违碍,故不能不有所删改;第三求进呈本字书无讹误,故进呈本以外,讹误遂不可问,可谓切中要害。这也成为责任追究时总纂、总校等人难以辩解的风险。

乾隆五十二年(1787年)五月,乾隆帝偶然在承德避暑山庄翻检文津阁收藏的《四库全书》版本,发现其中“讹谬甚多”。他下令复查,设法挖补改换。但随后又发现书中有“未经删削”等更为严重的错误。乾隆帝大为恼怒,认为“实属草率已极”,谕令对七阁《四库全书》全部重新校勘、抽查,并下令由原任总裁、总纂、总校各职的纪昀、陆锡熊、陆费墀等人分别负责。陆费墀因修书而致身死家毁的人生噩运,随之降临。

在四库修书的“三大员”当中,独以陆费墀所受责罚最为严重。乾隆帝在谕旨中对陆费墀大加斥责,称其屡邀恩赏,而所编之书“竟舛谬丛生,应删不删,且空白未填者竟至连

篇累页。荒唐若此,该员所司何事”。乾隆帝严令其陪办江南三阁全书装原职,令其继续编纂,但认为陆费墀仗势“牟利”的偏见,却没有太大改变。这一隐患,在乾隆五十一年(1786年)于敏中牌位撤出贤良祠后再次爆发。乾隆四十六年底,首部《四库全书》即文渊阁本编纂完成,进呈后获得乾隆帝称赞,随即下令再抄六部,分藏于盛京、承德、圆明园及江南的扬州、镇江、杭州等地,以昭“藏书丰富、教思无穷之盛哉”。《四库全书》卷帙浩繁,誊录人员参差不齐,但在陆费墀等人督促下,上呈“御览”的《荟要》及文渊阁《全书》定本,校勘质量应该还是不错的。不过分抄“北三阁”“南三阁”藏本时,“大功告成”的松懈情绪逐渐滋生,“捷于鹘”的侥幸心理也或多或少存在,因而抄本错误增多,在所难免。

著名史学家陈垣先生因此总结说,清代《四库全书》等官修书籍,“第一求速,故不能不草率;第二求无违碍,故不能不有所删改;第三求进呈本字书无讹误,故进呈本以外,讹误遂不可问,可谓切中要害。这也成为责任追究时总纂、总校等人难以辩解的风险。

过加倍。作为总校,陆费墀除校改誊录、分校、复校各环节遗漏的讹误外,还要对全书款式、卷篇、次序等进行把关。乾隆四十年年底撤撤复校,改由分校互校,总校的责任进一步加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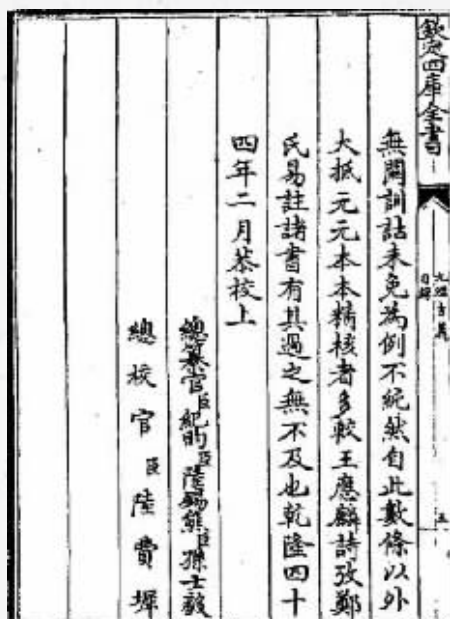
陆费墀不仅以武英殿提调之职掌管底本收发,以总校之职统领缮录的校勘校对,还要预估定本抄写时可能出现的“俗体字”、避讳字、形近字等问题。为此他编写了《辨正通俗文字》一书,分辨似、正讹、正帖通用字三篇,详细辨别文字的正、通、俗三体。书成后,誊录人员“倚为司南”,成为四库馆中的必备工具书。陆费墀又编撰《历代帝王庙谥年谱》《经典同文》等著作,“用便检省”,以减少因帝王避讳或字形相近而导致的讹误。可见强化校勘,减少书写错误,以免将来受到责罚,是陆费墀始终萦绕于心的重大问题。

乾隆帝严令其陪办江南三阁全书装原职,令其继续编纂,但认为陆费墀仗势“牟利”的偏见,却没有太大改变。这一隐患,在乾隆五十一年(1786年)于敏中牌位撤出贤良祠后再次爆发。乾隆四十六年底,首部《四库全书》即文渊阁本编纂完成,进呈后获得乾隆帝称赞,随即下令再抄六部,分藏于盛京、承德、圆明园及江南的扬州、镇江、杭州等地,以昭“藏书丰富、教思无穷之盛哉”。《四库全书》卷帙浩繁,誊录人员参差不齐,但在陆费墀等人督促下,上呈“御览”的《荟要》及文渊阁《全书》定本,校勘质量应该还是不错的。不过分抄“北三阁”“南三阁”藏本时,“大功告成”的松懈情绪逐渐滋生,“捷于鹘”的侥幸心理也或多或少存在,因而抄本错误增多,在所难免。

著名史学家陈垣先生因此总结说,清代《四库全书》等官修书籍,“第一求速,故不能不草率;第二求无违碍,故不能不有所删改;第三求进呈本字书无讹误,故进呈本以外,讹误遂不可问,可谓切中要害。这也成为责任追究时总纂、总校等人难以辩解的风险。

乾隆五十二年(1787年)五月,乾隆帝偶然在承德避暑山庄翻检文津阁收藏的《四库全书》版本,发现其中“讹谬甚多”。他下令复查,设法挖补改换。但随后又发现书中有“未经删削”等更为严重的错误。乾隆帝大为恼怒,认为“实属草率已极”,谕令对七阁《四库全书》全部重新校勘、抽查,并下令由原任总裁、总纂、总校各职的纪昀、陆锡熊、陆费墀等人分别负责。陆费墀因修书而致身死家毁的人生噩运,随之降临。

在四库修书的“三大员”当中,独以陆费墀所受责罚最为严重。乾隆帝在谕旨中对陆费墀大加斥责,称其屡邀恩赏,而所编之书“竟舛谬丛生,应删不删,且空白未填者竟至连



纪昀、陆费墀等署名的《四库全书》书影。

柯永华